

中国的货币本位困境：历史根源与演进机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张 杰

摘要：本文旨在探究中国低值货币本位形成以及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梳理隐藏在这种货币本位格局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机理与变迁逻辑，并尝试性地揭示，作为一种本位演进环节缺失的货币制度，在遭遇已然经历本位嬗递完整过程的外部货币体系的挑战时，所必然面临的货币困境的性质。本文的考察发现，在中国货币演进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特的“恋铜情结”现象，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各种利益诉求都纠缠于此，从而形成了一个的低水平的货币制度均衡。正是基于这种均衡，曾经负载着无数货币文化荣耀的“交子体系”才显露出其真实的货币面目，这种被誉为全球最早的纸币体系竟然只是覆盖在铜本位之上的一层绚烂“外衣”！循着此后的货币演进路径，铜本位与贵金属货币的冲突此起彼伏，到明清以降则愈演愈烈，并形成了“本位困局”。表面看是货币本位之争，实质上则是既得政治利益与新兴商业利益的殊死竞争，这种竞争随着近代西方高本位货币因素的进入而变得更加纷乱复杂。中西货币体系的冲突迅速凸现出低本位货币制度的“先天劣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货币本位的长期低水平徘徊使其丧失嬗递升级的基本功能，从而未能与银行体系建立应有的联系，最终使得中国的货币演进机制一直缺乏微观金融基础的有效支撑。重要的是，这种货币演进机制的缺陷无疑会对当下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产生长远影响。

一、引言：对基本走势的估计

大凡统一货币有两种意图或者效应，即：为商品交换之便利，抑或为政治意志驱使之便利。我们虽然不能贸然断言，秦始皇统一货币一定只是为了方便其政治意志之贯彻，但从当时货币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形推测，至少在主观上是这样，而为经济交易提供便利则是其客观绩效。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认为，秦始皇统一货币制度的“革命性”行动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多数文献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观点，亦即秦始皇将货币统一于非经济的层面之上，货币更多的成为财政意志的体现物。另外，由于秦始皇奉重农抑商为国策，其货币在体现财政意志的同时，又附着于小农经济格局之上。也就是说，货币成为既体现财政意志或超经济性（“上用”），又体现小农经济要求的特殊材料。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与铜钱，前者与封建上层消费相契合，后者与小农经济相匹配，从而呈现贵金属货币与铜本位币并行发展的历史现象。这大概属于非正常的情形。表面看来是金铜并行本位制，实质上，黄金在先

^{*}本研究得到 200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项目批准号：07AJY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90097）以及“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学科群建设项目—首都经济”专项资金的支持。

[作者简介]张杰（1965—），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秦货币经济贸易中的媒介性质已彻底改换成超经济运行的性质了。到汉武以后,贵金属日益超脱于正常的经济生活之外,成为官商之间媒介其奢侈消费和财政开支的工具,从中已无法感受到丝毫货币本位递进脉搏的跳动。

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为封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商业,与一般平民日常交换对充作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要求有显著差异,这就使得多种币材同时流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习见现象(萧清,1984,p.43)。于是乎,秦始皇币为二等(金铜本位)、汉武帝时期金银铜并存的货币制度,以及之后二千年间多品位货币并行流通的历史,是具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

加藤繁(1960)认为,“在公私经济方面,主要是商人和官吏用银最多。其中,特别是商人用得最多。因此,银和村落的关系比较疏远,主要流通于都市,辗转从都市流到都市,……于是银在商人和政府之间、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循环着。”(pp.137-138)加藤氏虽然是在说南宋,但这种状况自汉代就已出现。中国的货币轨迹受两重机制的规制,一重为财政的和商业的,另一重为小农经济的。可以说,中国货币的发展轨迹是由几千年间小农型低货币本位与财政、商业型高货币本位间十分微妙而不正常的交互作用来确定的。货币本位因其正常递进机制受到压抑而徘徊于铜本位之上,其内在所具有的向贵金属本位嬗递的冲动被无情阉割。这种状况与中国封建社会商人资本的空前活跃和农业经济的长期迟滞相终始,使中国货币本位在商人资本的异常繁荣面前却出乎意料地停滞不前。作为货币本位进化根基的农业货币经济和交换机制竟是如此之落后与不发达,国民生活水平又是如此之低,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在财政、商业间的“高本位”运行显然是不能代表一国货币本位的真正水平的。

商业的发展本来是促使货币本位进化的契机,但它若与政治的权力相结合,就不但不会成为积极的促进因素,反而成为吞噬其进化的货币经济基础的因素。因为,商业若沿着促进经济正常发展的轨迹发展,则会动摇封建地主经济的基础,所以,自汉武时官商结合后,“官”总是时刻使商业在维持小农经济运转的限度内发展,使货币本位也在铜本位的基础上徘徊,其贵金属只能作为其陪衬,使之锐气消耗于财政性、消费性、投机性的周转中。这样,就使贵金属无法与货币经济相结合(小农经济本身也无力形成贵金属货币渗透的土壤),只有浮于“上用”(财政、商业性周转)的层次了。货币本位嬗递机制也在商人资本与小农经济的渗透中失灵。商人资本虽然握有货币本位进化的枢纽,但在上,于财政契合消费性运转;在下,其包含着的大量贵金属又不断通过购买土地蜕化到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货币层次;贵金属一旦转入小农经济则会不断地被储藏,其残缺不全的交换机制早已注定不能起到促成货币本位进化的应有作用。实际上,中国小农经济中货币经济因素的成长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即在国家财政的驱使之下,才得以实现,从而使小农经济在其内部货币因素成长的同时,陷入国家财政和商人资本的夹击之中。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推断中国货币本位不但无望攀登贵金属的阶梯,就连铜本位币的存在也是不十分健全和广泛的。

从汉五铢通行近8个世纪,直到清末的光绪通宝亦与之等重,且从“西汉的五铢到清末还有流通”可知,中国发自经济内层的对货币本位进化的呼声是非常微弱的。彭信威说,中国货币的重量几千年间没有改变,“这种情形的产生,是由于这样大小轻重的钱币,从实践中证明

是比较适当的”(1958,序言)。但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看,说明中国货币本位演进之迟滞和货币经济发展水平之低下。

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推出了铜本位货币,按此推衍,大概从汉唐以来形成的货币经济的第二个高潮,可以推出银本位或银铜平行本位;金本位抑或纸币本位也会在随之而来的第三个、第四个货币经济的发展高潮中涌现。但是,自第一个高潮对货币本位发生积极而又强烈的推动作用后,货币经济在其曲折发展中,似乎从未对货币发生明显的推进作用。本来,铜本位币与银、金本位币之间存在内在的历史嬗递关系,可是在中国的货币格局中,却不体现嬗递关系而体现调和关系,铜本位币不但不让位于“高本位”,居然与之畸型耦合,并使“高本位”货币似乎总是处于附属地位。秦代的金铜本位,汉代的金银铜皮币本位,唐代的钱帛本位,北宋交子与铁、铅、铜钱并行流通的现象,就是货币本位进化机制被扭曲、变形的具体表现。

基于此,笔者曾对经济史学界对中国货币本位的历史轨迹所作的不十分审慎和夸大的描述表示惊讶。如傅筑夫先生就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贵金属黄金已经成了事实上(不是法律上)的主要货币,即一切货币职能主要都是用黄金来表现”;且将当时在多元货币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黄金作为支付流通手段通行列国间充当世界货币的现象,说成是“战国时期黄金”“能压倒其他一切货币”,“大量流通于全国”;认为“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因素已经产生和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并确认秦始皇的币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的金铜并用的复本位制”,乃至认为“西汉时期……不仅流通中的货币完全是金属货币,而且黄金一直占统治地位”,最后惊叹:“西汉时简直可以说是这种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1981, pp. 164-172)。傅筑夫先生的初衷是以秦汉以前即有贵金属的流通来为其资本主义萌芽于先秦的论点找根据,完全可以理解,但就货币史而言,这是没有对中国货币本位进化历史作仔细研究作出的粗率结论。中国是一个地道的铜本位币占据货币历史整个流程的国度,直到民国以降才有银本位的确立,谈何早在汉或更早便有什么金本位。难道中国自秦汉以后货币经济或货币本位不是发展的历史而是倒退的历史,抑或货币本位是由贵而贱的逆向递进?

先秦为何黄金流通异常频繁,那是当时列国间的政治经济的交往促成的;秦始皇为什么会采行金铜二等货币制度,那也是接先秦货币格局之余绪而形成的,但也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本位,货币经济在先秦的积蓄在始皇治下已很少保存,货币的高本位自然也是一个与经济相脱离的空架子。西汉将那么多黄金用于赏赐,黄金无法具备作为货币的完全性质,又缘何形成货币本位呢?贵金属的多少与货币本位的确立毕竟是有很大距离的。贵金属丰足,若经济发展水平尚低,仍不会有高层次货币本位出现;而经济发展水平高,贵金属有限,则会出现价值符号。唐宋出现钱荒,贵金属(如白银)没有走上历史舞台,而形成以绢交会铁铅钱补代之局面,反映了铜本位和实物货币与封建经济和人民生活有着特殊的关系。早在汉代,西域与交趾一带已通行银币,而不能推广到全国,可知货币本位的进化,除经济发展外,仍需要交换机制的成熟,尤其是国际贸易的繁荣,战国间贵金属的流通不是很具说服力的史实吗?

中国货币本位始终粘附于铜币之上, 值得审视。当时意识形态之熏染、小农经济之局限、交换机制之畸形等, 都是货币本位迟滞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 中国生产力的波浪式前进, 使铜本位一直具有存在的基础。先秦所积贮的货币本位进化的力量, 经秦王朝的揉搓而消耗殆尽。汉代货币经济获得恢复的机会, 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复归于实物经济而又完全丧失。经隋唐之恢复, 银本位有呼之欲出之势, 又跌入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深谷, 大量行用铁铅钱。宋代始有转机, 又受牧业文化之剧烈冲击而陷入困境, 出现交子(纸本位)这个早熟的货币形式。货币经济的如此徘徊式运行, 可以说是不断强化铜本位的基础。元明清三代的货币本位自然也不能超脱于这种逻辑之外。货币无法从铜本位上站起来迈向新的台阶, 到清末又被后来居上的西方货币本位的冲击所困扰。

中国货币的发展轨迹随着封建王朝的更迭而不断更迭, 表现为铜本位的一次次复归, 这和中国封建经济的运行周期也是相吻合的。当每个朝代的经济积攒了相当的生产力水平对贵金属本位提出要求时, 往往是经济低谷(战争, 改朝换代)的到来, 使货币复归到适于铜本位的水平。因此, 在中国多品位并行的纷杂的货币历史现象之中, 真正体现中国货币的发展程度、反映货币经济水平、充当完全货币功能而贯穿于几千年货币历史始终的是铜本位币。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史是一部铜本位货币史, 就如同中国几千年的货币经济史是一部小农经济史一样, 如下图所示。

时期	春秋战国	秦	两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五代十国	两宋	金元	明	清
货币经济历史趋势	盛 ↗	衰 ↘	盛 ↗	衰 ↘	盛 ↗	衰 ↘	盛 ↗	衰 ↘	盛 ↗	衰滞 →
货币本位	(金) 钱			钱 (帛)		(铁铅) 钱		钱 (钞)		(银) 钱

这就是彭信威先生所说的: “战国、秦汉, 勉强可以说是金钱平行本位, 六朝、隋、唐是钱帛平行本位, 宋、金、元至明初是一种钱钞流通制度, 明中叶到清末是银钱平行本位。”(1958, 序言) 战国以后几百年间出现金钱平行本位, 是春秋战国货币文化融合较量之余波使然; 经两汉进入魏晋, 货币经济滑入低谷, 部分地回到实物经济的层次; 隋唐也只能恢复到钱帛平行本位; 宋金以后, 纸币以补救铜(铁、铅)本位的面目出现; 明中叶后, 银本位在西方货币势力的震动下提上议事日程, 但由于中国货币经济本身对完全银本位的要求有限, 仅能维持银(两)钱平行本位; 经 20 世纪 30 年代的废两改元, 才勉强确立银本位; 不久又在中西货币文化的冲突中扭曲为汇兑本位, 从而使金本位在中国的货币历史上终付阙如。

二、一个奇特的货币现象：恋铜情结

中国的货币文化基本上是铜文化,几千年间,不论封建王朝还是苍苍蒸民都对方好圆肉的铜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之情。对于封建王朝,她既是其施行神权统治,以御万民的工具,又是其统治机制赖以生存的根基——农业经济的象征物。在统治者心目中,铜货币就是他们所企求的王朝千古相传的吉祥物。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命运同铜货币拴在一起,极力维护其形象,保存其内质,以寄托对自己统治“天圆地方”的情愫。对民众来说,其低下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与低值的铜货币形成天然的紧密联系,他们担心她的贬损给自己的生计带来威胁和灾难,所以总是虔诚而愚昧地乞求她的完好存在。于是乎,他们便把自己的命运和铜货币拴在了一起,为其稳定而欣慰,为其贬损而痛泣。这样,就形成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恋铜情结。

早在汉初,贾山的一席话就道出其中三昧:“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¹。明季靳学颜的议论与贾山遥相呼应:“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于天下,奈何废而不举?”²作为封建皇权的象征物,就不能让他人享有铸造的权力(统一铸造权的客观意义,容作别论)。秦始皇集铜于咸阳;汉武帝输铜于三官;王莽施行“六管”,“敢挟五铢钱者,投诸四裔”³;隋高祖“行新钱,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⁴;明季启祯时“广铸钱,扩古钱以充废铜”⁵;等等。由此可见统治者对铜币的执着之情。

当交换发展(毋宁说是商人资本的发展)造成铜钱不足时,封建王朝极力扩铸铜钱;在代表商人势力的银本位呼之欲出时,又极力加以排斥,乃至施用封闭银矿、禁止用银等手段,以维护铜币的“御民事”的神圣地位。其内质是,铜币由朝廷铸造,打上神权的烙印;而白银则称重量按成色行用,一来不易烙上神权之印记,二来银块大都深藏于“豪右大贾”手中,朝廷很难掌握,用银就等于交出“利柄”和“御民事之权”。但历代封建政府都面临着像咸丰时“铜斤短少,不能增卯多铸”⁶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铜、银本位的问题最终成了封建经济内部地主阶层(统治者)和豪右大贾或商人阶层矛盾的焦点。保守派竭力维护铜本位,商人则极力主张用银。这种矛盾在明清以来愈演愈烈,清代的银铜并行本位,在一定意义上又何尝不是这种矛盾的产物呢?

当然,作为封建经济制度构成要素的铜本位币,从一产生就极“利而巧”之能事。封建统治者之所以要维护铜币的完整性、独一性和集中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财政的需要。从汉武帝铸币“以澹用”和“摧浮淫之徒”开始,历代无不藉铜币以资国用。因为,铜铸币实

¹ 《汉书·贾山传》。

² 《明经世文编》卷299。

³ 《汉书·食货志》。

⁴ 《隋书·食货志》。

⁵ 《明史·食货志》。

⁶ 《清史列传》，周祖培疏。

际上是一种名目货币,历代王朝都把铸钱作为获利的重要手段,直诱得几千年间民间商人不断地盗铸。为了独享铸钱利益,历代都无不垄断铸造铜币,极力反对商贾盗铸,不惜施以极其严厉的酷刑。殊不知朝廷既然以铸钱获利,天下焉有不效之理。诚如司马太史公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不避法禁,去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⁷从汉初的榆荚半两到咸丰的大钱,遥遥相应,数千载间,封建王朝无不处在一个“铜重则滋销毁,本轻则多私铸”⁸的尴尬局面中。铜币名实相符,则无利,无以“澹用”,也不会诱发盗铸;但朝廷财政每每告罄,不能不从铸钱中获利,因此,必然出现名实不符的现象,盗铸造也就在所难免,贾谊所谓“县法以诱民,使人陷阱”⁹是也。由此可知,铸钱以谋利与极“澹用”之能事,是封建王朝“恋铜情结”的内质。正是由于几千年来铜币为封建王朝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它们从未放弃过对铜本位的依恋。汤因比一语破的:“货币的发明,无疑地有利于发行货币的政府和臣民——尽管它给社会带来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破坏性波动和高利贷的引诱力。但获得最大收益的当然还是发行货币的政府本身。”(汤因比,1956,p.74)

唐代出现钱荒以后,政府以强制手段使钱帛平行行用,从实质上言,钱帛平行本位仍是铜本位。帛只不过是一种忽而实物忽而媒介物的准货币而已,始终处于补救地位。宋代又以铁、铅钱或交、会等补救之。渊源于宋代的折二钱、元明实行的多级钱制和短陌制、清咸丰时的十六级钱制无不表现出对铜本位百般地维护。

在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作用下,白银这个数千年来处于沉寂状态的高本位金属,逐渐登上货币历史舞台。但是,在古代中国,银本位币从根本机制上则是作为铜本位币的对立形态而存在。前者代表商人阶层,后者代表地主阶级;前者很早就流通于都市,周转于豪门大贾之间,后者则始终凝固于农业经济中,政府藉以澹用,人民赖以周转。于是乎,封建统治者和广大民众成为系在铜本位币链条两端的一个死结,它们虽然各自偏好不同,且时常较量,但都无法挣脱其羁绊。作为“革命性”力量的商人资本寄托于这根链条之上,依赖其震荡而存在、发展乃至膨胀。银本位币在中国古代徒具高本位之外壳,终封建社会几千年,从未代铜本位主宰过货币本位的进程,而是以铜本位的陪衬身份委屈于货币历史的长河中。商贾阶层或商人资本原本作为银本位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无法成为参与构成商品货币经济机制的要素,而陷于既是铜本位的寄生者、又是铜本位的对抗者的矛盾之中。

明中叶以后掀起一股轻银重钱的思潮,其实质则是从《管子》“利柄”思想出发,为封建货币制度呐喊,表现出一种恋铜偏执;同时,反映出地主统治集团与日益成长的商人阶级的矛盾冲突,如所谓:“若使银独行而钱遂废焉,是不过数十里富室之积,足相拟矣”¹⁰云云,可见一斑。难怪清宣宗对林则徐所铸银币的意见¹¹大为不满,斥之为“太变成法,不成事体”¹²!

⁷ 《史记·货殖列传》。

⁸ 《清朝文献通考》卷15,考4990。

⁹ 《汉书·食货志》。

¹⁰ 《明经世文编》卷299,靳学颜语。

¹¹ 《林文忠公书·江苏奏稿》。

三、交子的性质：是怪胎还是货币革命？

铜本位赖以存在的基础毕竟逐渐受到缓慢发展的货币经济的震荡。但是,新本位构造的机制又受到商人资本畸形发展的扭曲、银货难产的阻塞、铁铅铸币的拖滞,还有财政意志的驱使,从而使唐宋以降的中国货币发展史形成一种奇异的格局。

诞生于公元 11 世纪的交子,曾被誉为世界纸币之滥觞。但其内质究竟如何呢?王亚南先生说:“中国之有纸币,由来已久。那不是由于商品流通便利上的要求,而是由于国君或皇帝有了任意发行纸币的权力”(1957, p. 87)。他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交子的发生正是由于“商品流通便利上的要求”,后来政府发现其中奥秘,才以“权力”加以驱使而“任意发行”。汤因比说:“流通券的发明,直到它与中国的造纸和印刷两大发明相联系以后,才得有效的应用。”(汤因比, 1956, p. 74) 汤因比也说对了一半。纸币的出现的确需要纸和印刷术,但仅具备这两个条件还远远不够,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发达的商品交换。进而言之,更重要的条件是货币本位的成熟过渡和信用制度的发达。这两点,在交子产生时具备了吗?没有。当时之所以在四川产生交子,起初仅仅是由于铁铅钱大量铸行,不便流通的缘故。“蜀人患铁铅之重,不可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¹³在这种情况下,交子的产生属于一种早熟的经济货币现象。正如萧清先生所言:“在宋代……白银本来很快就将取代铜钱而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可是它的这一发展过程,却因我国纸币的产生及广泛流通而延缓了”(萧清, 1987, p. 239)。

从宋元以来几百年的纸币流通史实看,纸币(楮)总是处在由铜本位向银本位的演进过程之中,是对铜本位的补充和挽救。可以说,唐代是用帛补铜钱之不足,而宋代则先以铁钱后以交子补铜币之不足,直到清代才将唐代以来徘徊不前的(帛)钱、(交子、铁)铜钱本位转化为(银)钱本位,中间还隔了一个元朝以钞代铜银、明代钞钱银并行流通的阶段。可见,中国交子的产生不仅是早熟的,而且还是畸形的。即在宋代铜钱不足、铁钱大行的情况下,加上印刷术的推动,才出现的。这显然不是正常纸币产生的过程。

萧清先生在论述这一段历史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宋代承唐以后,仍一直感觉流通中铜钱的不足,这说明客观上已需要更多数量的货币以及单位价值更大的贵金属作为货币了。然而入宋以来,由于商业及货币经济的发展,唐代钱帛兼行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绢帛已逐渐失去了货币的资格,可是白银的流通也还不够广泛;另外,在货币流通方面又由于历史的原因,承袭了五代时期铜钱、铁钱流通的遗产,……发展成为铜钱区与铁钱区的流通制度,这就严重阻碍着商业发展以及各地的物资交换。”¹⁴从此便推出交子产生的逻辑过程。但应须特别提出,交子仍属铜本位系列,从“交子行之于蜀则可,于他,利害大彼不同”¹⁵可见端绪。也就是说,交子只不过是四川铁钱的代用品,实际上属(铁)铜本位。政府垄断发行后,表面上虽成为一种纸币,但仍无法改变其铜本位的内质,只不过另加上财政的需要而已。

¹² 《清实录·宣宗实录》卷 236。

¹³ 《宋史·食货志》,时四川铁钱 1 贯 25 斤或 13 斤,一匹罗值 2 万钱,重 130 斤。

¹⁴ 同上,第 241 页。

¹⁵ 《文献通考》卷九《钱币二》,吕祖谦语。

北宋第一次在陕西推行交子时,宋神宗就泄漏天机:“行交子,诚不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¹⁶政府发行官交子其准备金仍为铜(铁)钱,在这种情况下,若充分兑现,不足以解决财政困难和钱荒现象;若不兑现,则必然受财政意志之驱使,使钱荒更为严重。这可从北宋交子滥发。南宋关子恶性膨胀而钱荒未见解决得到证明,从中亦可洞察纸币与铜(铁)钱的微妙关系。正如马端临所言:“昔也以钱重而制楮,楮实为便;今也钱乏而制楮,楮实为弊。”¹⁷朱楔(1943, pp. 134-136)也说过:“(明代)行使钞法,其动机在替代铜钱,……以故推行钞法之初,即不能打破钱钞兼行之局面。”但是,朱先生又云:“洪武禁用铜钱,专行钞法。实合于现代之通货政策”云云。这是不透彻的,是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纸币”本位的真正内质的论断。不论信用货币还是财政货币,都要受商品经济与商品流通水平的规制,而经历铜、银、金、纸本位几个阶段。可是,明代的钞法从未体现这种趋势。诚如顾亭林先生所言:“钞法之兴,因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¹⁸由此可以断言,中国古代的纸币本身是铜本位走向没落、银本位无力勃兴情况下产生的一个因早熟而畸形的怪胎。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钞法只是作为一种补救铜本位的早熟的要件而存在,正是在其补救之下,铜本位才获得喘息之机会,一直延续到清季民初。但从“资本主义生产是与其条件的发展同时发展的,其条件之一便是贵金属的充分供给”(马克思,1975, p. 367)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货币条件是远远没有具备的。铜本位币之所以能在楮币的补救下残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封建专制货币文化和小农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

尽管交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并不具备先进性。如上所述,它实质上只是铜本位的化身。另外,我们还要消除这样的偏见,即认为只要不发生钱荒现象,铜(铁)钱的流通并不算本位的落后。这要看世界货币本位发展的进程,因为经济、货币文化的交融性必然要使货币本位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撞击与融合。当别国采行银本位时,中国自己的铜本位币即使可以满足流通,也不能算本位的适宜。

就元代的货币制度而言,交钞与宝钞为先后发行的两种纸币,即在两种不同的建议下所发行的纸币,也许应当说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交钞是丝的价值符号,宝钞是钱文的价值符号,可是两者同样对白银作价,并以白银来兑现。可见,这是一种四不像的纸币制度,铜本位、帛本位、银本位、纸本位的痕迹都有,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理解为银本位。彭信威说:“中统宝钞虽然是以钱贯为单位,实际上也曾铸造中统元宝、铜钱,但宝钞却以金银为保证,而以白银为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银块本位制度”(1958, p. 560)。其本位界限实难界定。但从《元史新编·食货志》“中统建元……印造中统元宝。……稍有壅滞,出银收钞,恐民疑惑,随路桩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动”看,虽然元代货币制度名目不定,但以纸币流通为主,不许银铜流通是无疑的。元代货币制度毕竟是对中国沉闷的货币氛围的一次震撼,特别是元代纸币制度中渗透着好几个“条画”的精髓,如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整治钞法条画》、至元二十四年

¹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¹⁷ 《文献通考》。

¹⁸ 顾炎武:《日知录》。

(1287年)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中统二年(1261年)的《元宝交钞体例》等。甚至在至大二年(1309年)实行了一次更彻底的币制改革,发行“至大银钞”十三等,收回中统钞,使中国的币制更接近于银本位。但从“至大银钞”的短命(行用不到2年,武宗死后,仁宗时复归到中统、至元钞)可以看出:离真正的银本位尚远。到至正十年(1350年),遂退回到宋代的铜钱本位(发行至正通宝)。深层的原因是,元代的货币制度(牧业货币文化)一旦与中原(宋代)的货币格局(农业货币文化)相撞击,便逐渐被后者浸染,货币毕竟无法独立于经济格局之外。更奇怪的是,在至大二年(1309年)通行银钞时,竟允许历代古钱流通,不知是什么思想作祟。总之,元代货币制度仍是宋代以来货币怪胎的继续,如中统钞、至元钞只对银作价,至大钞同时又对银铜作价,至正钞只对铜作价,这难道不是农业货币文化(铜货币文化)对牧业货币文化的兼融吗?所以,纸币在元代仍然和宋代一样是一种畸形的货币形态,以纸币为表,以铜本位为里,这是透视扑朔迷离的元代货币制度而得出的结论。难怪彭信威亦叹云:“元代的纸币、铜钱、金、银四者的关系是混乱的”。¹⁹

明季王世贞曾经说过:“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邑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²⁰可是,中国古代经济格局和货币文化特征决定了纸币本位迟滞、早熟相混合交织的特质,不可能实行彻底的铜本位(铁本位)或银本位乃至纸本位。纯铜本位曾被钱荒所震撼,铁本位曾受流通不便的局限,银本位受经济发展水平、银产量等因素掣肘,而纸币制度又屡受财政意志之驱使而崩溃,所以只有实行一种混合的货币制度。元至大四年的《往罢银钞铜钱使中统钞条画》中有这样一段话:“钱虽古制,时用不同。比者尚书省所发新旧铜钱,具有缗数;其民间宿藏者,所在充溢,不可胜算,虽畸重使用,便于纳银,然壅害钞法,深妨国计。”可知,当时民众方便行用者为铜钱,只是由于元代以钞法为国计,所以才将铜钱“依例倒换”成纸币,并以“违者治罪”诸手段强制维持。

明代的货币制度虽然体现了银的重要性,但实质上仍是钱本位,且延续了钞与铜本位相互藕合的畸形格局。明初即出现“宝钞跌价,铜钱重量反而增加”的现象。由于病症于前代一样,所以对策也就如法炮制:以禁用铜钱流通来使宝钞。明成化十六年(1481年)邱浚的币改方案,表面上是银本位,实质上是钱钞本位。明代曾经推行银本位,是为掠取民间之银和“补充货币数量的不足”,李自成进北京,有人说及明末无人兑钞,蒋德景云:“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参见彭信威,1958,p.635);民间用银则是为了避免钞法之弊(贬值)和铜钱之不足(朝廷封钱于国库以推钞法)。明中叶后,白银的货币地位增强,嘉靖后,用银渐多,逐渐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并行本位,开清代货币制度之先河。但银本位仍然无法从铜本位中独立、超脱出来,这已经预示了近代中国货币本位的悲剧性结局。

明中叶后用银渐增,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铜、钞混合货币格局本身无法正常发育并支撑经济生活运转的产物。从客观上讲,银币的使用与民间习用铜钱的格局或者经济的

¹⁹ 同上,第564页。

²⁰ 《兖州史料后集》卷37,《钞法》,王世贞言。

发展水平难以协调；从主观上讲，于如前所述的“恋铜情结”相抵触。《明史·食货志》载，隆庆初年就有人主张要使民富足，必重布帛菽粟而贱银，贱银必须用钱，便是这种格局的反映。就在这时，西方的货币势力已伸到中国领土。公元1518年，西班牙国王铸造双柱银元，随着西班牙人来华贸易流入中国，揭开中西货币文化正面冲突的序幕。在西方货币文化的挑战面前，中国币制的历史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换一个角度看，诞生于11世纪的交子曾开辟了人类钱币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但这一创举却被挟制于补救铜货币之不足和解决财政困难的夹缝之中，失去了原来的信用货币意义。实际上，交子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北宋以前货币历史的重演，这段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这个中国货币经济的确立时代。

近代以降，王献唐对先秦的信用货币——布币有精深细致的研究。他认定：“布帛渊于契券”，“以布币求契券，契券即布帛之因也”（1979，中，p.878）。《周礼·小宰文》云：“称责用傅别，取予用书契，买卖用质剂，皆以木片为之。”《列子·说符篇》云：“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由此推得这种“契”即一种信用凭证，后来演化为周秦之布币，皆周货币文化之遗产。但这种信用凭证到秦惠文王统一货币时，即行废止或者被扭曲；在东方商货币文化区却取得发展契机。汉代以降，皮币表承先秦布币之遗绪，而实为敛财之工具，布币精神从此丧失殆尽。布币之所以在春秋畅行，则是以先秦商品交换的充分活跃为前提的，即所谓“非商品繁盛之区，不能产生”是也。可见，中国信用货币与纸币之源流应分别观之。前者，源于先秦之布币，寓信用精神于其中，与商品交换共存；后者则与财政意志藕合。汉武帝托古之制而造皮币²¹，行“利而巧”之歧途，与布币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唐代因货币经济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有飞钱（便换）的出现；北宋交子亦为其遗绪，但官交子垄断发行后，则失却其布币之信用精神，而导向财政之实用。

尽管信用货币一直未能确立其地位，但与财政货币的界限仍然是明显的。信用货币（布币与铲币有别）以契券为渊薮，刀、铲、环、贝诸货币从一定意义上言属财政货币。但秦汉时期，信用货币泯灭而财政货币独行。然而，信用货币作为先秦货币文化中一份泯灭至今的遗产，虽然被周货币文化的气息吞噬殆尽，被“利而巧”的氛围扭曲变形，但其蕴藏在货币经济中的潜在能量仍不时涌动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如唐之飞钱、宋之交子等）。可悲的是，这种涌动最终还是被财政化了，其信用的、交换的、媒介的性质总是被财政的和其他的非经济性质所吞没，从而使中国真正的信用货币的发展存在一个极不完善、相当模糊的历史痕迹。

我们的货币史研究往往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货币起源混而淆之了。由于货币国定说一直统治着古代中国货币起源研究的论坛，因此人们一味地探讨货币究竟产生于三皇还是五帝，忽视对信用货币的探讨，就是意料中事。因为要认识后者，必须先确认货币源于商品交换。亦即货币原本不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商品的外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家掌握货币铸造权以前，

²¹ 《仪礼·聘礼》：“礼，玉、束帛乘皮”。“陈皮北首西上，文拭壁，展之会诸其币，加于左皮上”。《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礼记·月令》：“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媒介商品交换的价值形态在摆脱简单商品流通过后,并不仅仅局限于实体货币,而逐渐向非实体货币即信用货币拓展;国家掌握铸造权后,这一格局一般来说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比利时经济史学家亨利·皮朗的一段话发人深思:“把商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相继承的形态:第一个形态以物物交换(自然经济)为特征,第二个形态以货币(货币经济)为特征,第三个形态以信用(信用经济)为特征,这种理论流行已久。但是,研究一下事实,就会明白这实际上并无根据,这只是系统化嗜好的又一例证,这种嗜好常常影响对经济史的研究。信用的作用不断地扩大,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同样真实的是,在各个时期,信用都有作用。信用在各个时期中的差别只是量的,不是质的”(1964, pp. 106-107)。信用货币以交换为前提,这是毋庸置疑的。先秦为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渐次出现以券代钱的现象是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国际贸易动辄千万钱,搬运不便,这种情况遍及六国尤以齐为盛。史称太公为周立九府圉法,其中就有布币²²,后行于齐国,我认为这可能就是信用货币;它和唐飞钱合券以取钱货的道理是一样的。纵观数千年货币历史,信用货币(或准形式)的出现和行用与商业的发展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先秦商业发达,信用货币布币(契券)出现,秦至唐近千年间重农抑商严重,商业受到严重遏制,此间信用货币无闻。唐代商业发达(加之钱荒出现),使泯灭千年之信用券以飞钱的形式出现,便是必然中事,只不过烙上“为钱荒之补救物”的印记而已。到宋代,四川商品交换的发展与铁钱之不便相冲突,遂使这种信用货币获得再次复苏的契机,但被官交子的发行引向财政货币。这和先秦货币经秦汉之抑商和财政意志之驱使使信用货币精髓失落的命运是一样的。

四、徘徊于财政需要与商人利益之间

先秦刀、环、贝、铲并存的货币体系折射的是当时多元发展的货币经济格局,“战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规,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²³,还有货币异体,这实际上是一种充满机遇与激励的图景。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种“多元”进行整合的路径和性质直接关系到经济、货币发展的未来前途。

秦对六国政治经济以及货币之“异”的整合体现着强制性:“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²⁴这个“同”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秦始皇没有在统一全国政治的同时,允许战国以来各国各具特色(异)的经济按照各地的不同水平因地制宜地发展,而概以强制力“同”之。就连史籍“非秦纪皆烧之,更以秦史同天下之史”²⁵,何况体现神权、利柄的货币呢!结果,将各国不同格局的经济、货币捆绑到秦国重农抑商及其代表物“半两”钱之上。这样,货币虽获取短暂的统一,但其中渗透着各国经济、货币内动力的压抑和由此带来的服从。这种压抑性的统一和不服性的屈服,是秦国政治经济短命的一大根源。进一步看,这种势态使原

²² 这里的布币(信用货币)与通常所说的布币(实物货币)有别,但其界限迄今未能作答,容作别论。

²³ 《说文叙言》。

²⁴ 同上。

²⁵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来六国的货币性格从经济的层面一下子凝固到政治的层面之上,成为几千年货币历史上割据局面不时出现的原因。可以说,春秋以来各国货币在货币文化的融合进程中已逐渐趋于统一,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秦国之统一则以强制力割断其融合进程,即以政治的和武力的强制统一阻隔了货币统一的内在机制即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各国(地)间贸易的活跃。

话又说回来,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国家的货币不体现政治意志,但也没有一个统一国家的货币以体现政治意志而长期稳定。货币运行的最佳环境在于政治意志与货币经济规律相协调,而非相分离。若二者分离,要么出现货币割据局面,导致币制紊乱;要么滥用政治权力,滥发货币。这种情况在秦始皇以后,逐渐演化成为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大难题。秦始皇统一货币正是以政治意志压倒经济意志而实现的,他将强制力不分青红皂白地施于政治和经济之上,遂造成政治统一、经济上压抑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隐藏着一个不祥的转机:秦统一前,六国以政治力相对抗,是一种刚性对立;统一后,六国就以割据形式对抗,是一种弹性对立。弹性对立比刚性对立更加具有渗透性、柔韧性,从而极难解脱或化解。原来作为货币文化融合的各个因子,都蜕变成了货币与经济割据的因素,这是一个悲壮的转换。因为货币关系的发展程度,是与整个商品生产的发展相照应的,政治上的强制毕竟是外在的和暂时的,货币的发展总是寻觅商品生产的故里,更寻觅货币文化的民族故乡,这种寻觅在先秦和秦以后以完全不同的内质和导向表现出来。前者表现出政治在经济层面上的寻觅,而后者则表现为经济在政治层面上的寻觅。秦统一后六国贵族的抗秦就是将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结果只能具有和秦国一样的文化内质。货币经济历史在秦代转换机制的失灵,使中国此后货币的割据意识和政治财政意志永远凌驾于商品交换的经济意志之上,对货币发展史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以至到近代成为难以清除的积淀。在现代经济中,“一控就死、一放就乱”两难局面的存在和“诸侯经济”的形成,又何尝不体现这一积淀的沉重呢!

雒雷先生说过:“秦兼天下,一制度,六国的法律制度皆被废除,但六国在各自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习俗及各种地方势力并不会因秦法律的颁布而被彻底铲除”;“秦国经济发展较晚,并一直奉行抑商政策,货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些则是秦未能统一货币的内在原因”;“秦不具备足够的货币经济实力,而又想在全国统一币制,这必然使它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中”(1989)。我们手头虽然缺乏秦统一货币后原六国行用半两的实际情况,但是,可以想象其推行与反推行的斗争是何等激烈,仅从张良锥刺始皇于博浪沙可见当时六国对秦的义愤。我认为,这种义愤固然有狭隘的分裂主义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秦的超经济强制造成的。若秦国力主恢复经济,使六国经济得到延续和发展,这种狭隘的义愤便会逐渐被货币经济的柔和气氛所淡化。可是,这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历史假设。

这一格局的积淀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既然秦以超经济力对抗六国经济,那么六国贵族及民众的对抗也一定是超经济性的。斯宾格勒有如是说:“一种比较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它不仅不能形成它的纯粹的、特有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识。年轻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一切都铸进了古老的框框里,年轻的感情僵化在衰朽的作品中,它不能凭自己的创造力培育自

己,它只能用一种日形增剧的怨恨去憎恶那股遥远的势力”(1918, p. 330)。这样,就将经济协调统一的趋势和货币统一融合在经济层面上的一切期望变成幻想,接踵而来的是历代货币的统一与反统一、割据与反割据、私铸与反私铸的长期对峙,且一直延续到近代。

汉武之后的盐铁论战,是一次历史性的较量,它泄漏了一个货币历史奇谜的谜底。在这次较量中,儒士们主张放任与令民自铸,以与中央集权统一货币相对抗的态势出现,这大出人们的意料。实际上,在这些儒士的思想中,儒家精神仅存其外壳而已,他们的放任思想似乎具有复古意味并以维护小农经济为内核。因为自汉武后,儒家精神只不过是一个构成当时意识形态的要素,亦即它放弃了最可贵的商文化精神的内质,所以,其主张的放任更多地具有与小农经济相契合的性质,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放任。这种放任,从根本上言,是与当时体制中法商相结合的内质相统一的。

然而,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当时的“统一”是针对业已蜕变了的商人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所谓放任)而发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样看来,儒士之主张放任和王朝之主张统一反而存在更多的对抗性质,这是怎么回事呢?

自汉武以来,政府之统一一直面临着两种势力的严峻挑战:一种是儒士们的放任主义(主观上);另一种是地方商业资本与割据势力的结合和膨胀(客观上)。基本格局是:儒士们与封建割据势力和商人资本的结合体站在了一个阵线上。儒士们的放任是在为地方商人和割据势力呐喊,只不过掩饰以华丽神圣的儒家精神之外衣而已。这从司马迁《平准书》和桓宽《盐铁论》中可以窥其端倪。司马迁云:“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²⁶从“封君皆低首仰给(于富商大贾)”可知二者结合之紧密;从“不佐国家之急”可知与中央集权之对抗。这是何等明晰之史实!因此,货币铸造权的统一对象只能针对那些小商业者,对于与地方封君相勾结的“真工大盗”,仍不可禁,继续“盗为之”。中国此后几千年货币发展史之所以长期动荡,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自始皇以来,将被压抑的商人资本(重农抑商)和被压抑的六国地方势力压挤到一起而成藕合之势;汉武承其遗绪,只多了一个儒家的理性氛围,亦即始皇排儒,汉武尚儒。汉代开始形成官商(严格说来是地方地主势力与商业资本默契)结合局面,在经济上往往以货币私铸(或盗铸)为依托,最终出现与中央封建集权相对抗的局面。对付这种局面的最良之策,司马迁早已言及:“因势利导”,但汉武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结果使地方商人资本与地主势力的结合越扭越紧。早在“孝文时……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²⁷所以,汉武以后,地方商业资本的膨胀已不能代表进步的力量,因为其扩张不是经济因素的作用促成,而是与政治割据势力相渗透并畸形发展的结果,于是乎历代统一货币的着眼点就被吸引到了中央势力与这个畸形扩张的力量争夺利权的斗争之上,反而将货币统一以有利于货币经济发展这一主要方面淡化了(尽管货币统一在客观上有利于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的发展)。

根本的问题在于历代统一货币是以财政意志的贯彻为出发点,以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权和

²⁶ 《史记·平准书》。

²⁷ 同上

赖以建立的小农经济基础为导向，而不在于完善货币统一的基础即货币经济的良好机制。历代的商人资本在地方割据政治势力的挟持下不断膨胀，很容易形成政治与经济、货币的割据局面，严重妨碍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商人资本这个“活跃因素”不断蜕化变质。这一切是归咎于西周分封体制，还是秦皇汉武的政策？可能二者皆有，但以后者更甚。因为西周分封制是一种“因俗而治”的体制，是用经济手段促成的；在使当时商人资本获得独立发展的同时，未与地方势力相结合，反而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多元货币文化的繁荣与融合。看来，病根在于秦皇汉武的政策。

自汉以后，尽管历代王朝不时付诸货币统一的努力，但总不能扭转货币割据及盗铸不时兴起的局面。汉末魏晋南北朝之货币混乱达几百年，隋唐货币的统一充盈着私、盗铸的气息，接着又陷入五代十国的货币紊乱之中。宋元明清以来虽然货币貌似统一，实际上，货币的分割状态一直严重地存在着。明清以降到近代，各地货币不能通用，且成为地方军阀势力的财政筹码，仍可以窥见秦汉时期诸侯割据的影子。

近代在中国流通的货币更是千姿百态，铜元、银元、制钱，银两、纸币“争奇斗艳”。就制钱言：“吾人所知者，官铸有样钱（北京官局铸出之钱）、制钱（各省官局铸出之钱）、白钱（色稍带白）等各种，皆形大色美。私铸则有所谓沙壳、风皮、鱼眼、老沙板、毛钱、灰板、鹅眼、水浮等名目，盖皆薄而小，杂以土沙铜铅锡，而铸造者也。人皆夹此小钱于制钱中以充用，而钱之市价，钱之名称，亦因此私钱混杂之多少，而大有分别。曰大钱（尽制钱也）、曰清钱（同上种）、曰毛钱（千中夹百个私钱）、曰一九钱（千中制钱九百私钱一百）、曰二八钱（千中私钱二百）、曰三七钱、曰四六钱、曰对开钱、曰倒四六钱（皆视私钱之多少而别者也）、曰卡钱（悉制钱，纳税厘之用者也）、曰典钱（大钱，当铺中所用者）、曰冲头（百中私钱五六个）、曰衣牌（衣服店用）、曰酱钱（酱油商用）、曰红钱（皆大钱）、曰青果钱（形其两头尖小也）、曰当头炮（每串两头夹小钱两三个）。以上所举者，固不各地尽同，然其紊乱之甚，可想而知矣。”（张家骥，1926，p. 98）就纸币言：“在中国流通的纸币……（1）中央银行纸币，（2）省立银钱行号及其它政府机关发行之纸币，（3）中国私立银行纸币，（4）外国银行纸币，（5）实业及其他团体、公司及个人发行纸币……有代表银元者，有代表银角者，有代表银两者，有代表铜元者，有代表制钱者，形形式式，颇极复杂”（周伯棣编译，1934，pp. 168-169）。就银元言：1894年张之洞在湖广试铸银元，铸造权旋即控制于地方之手，成为财政意志驱使的对象。由此造成成色不一，计量单位、砝码互异，流通割据，加剧了币制混乱。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在天津设造币总厂，于1910年公布《银本位币则例》，1911年方统一铸造；接着又陷入北洋军阀十几年的货币割据局面中。就铜元言：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财政处等会奏云：“各省铜元局已设多处，且有一省数局者。在各省督抚，无非以筹款维艰，而铜元余利甚饶，亟思推广运销，借资挹注。”²⁸银两之杂乱更不待言（参见魏建猷，1955）。试想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通、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将是何等状况。我认为，这是一种沉重的历史积淀或后遗症。把在几千年间陆续要解决的货币问题都堆在近代一个世纪里，积重难返是可以想象的。近代的币制改

²⁸ 《币制汇编》，第1册，第122页。

革步履维艰,便是最突出的表现。因为,货币制度的改革,意味着货币封建性的减弱或消除;何况货币的紊乱是封建政治经济割据的依托。所以,清末乃至民初各级官吏都对货币改革抱有一种惧怕心态和持抵制态度,这种消极和对抗情绪,直接断送了币制改革的良好前程。难怪陈其璋慨叹:“利国利民之计,久挠于不肖官吏之私,深可叹也!”²⁹

五、货币本位调整的困局

中国自秦汉以来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但又是几千年独步的货币发展历程之后,到 19 世纪却不得不面对来自西方的一种异质货币文化的有力挑战。这种货币文化以其殖民的和超经济的力量冲击着中国的货币文化,中国货币制度在其挑战面前表现出彷徨和无能为力,以耻辱和血泪为中国几千年古老的货币文明打上了最后的一个结。

中国曾被誉为纸币的故乡³⁰,可到了近代,它却成为殖民者掠夺中国经济的利器,就如同西方殖民者以中国发明的火药来侵略中国一样。中国货币在近代的一系列矛盾就是在中西货币文化的剧烈冲突中展开的。由于几千年的沉重积淀,使得每一个矛盾的展开和解决都表现出十二分的尴尬、局促和捉襟见肘。

中国的银钱平行本位在近代表现出极度的困扰状态。自从明末清初西方银本位币进入中国以来,银钱比价的忽跌忽涨使得这个平行本位的自身存在机制已完全松弛并解体。透过近代一个多世纪的货币本位变迁迷雾,可以听到银本位难产剖腹的呻吟,看到银钱平行本位在银本位诞生前后的挣扎。

然而,近代货币困境的真正内含在于:一方面,要走出落后的以铜本位为依托的封建货币轨迹,向近代货币本位(银、金)迈步;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处于两难的选择境地,即既要维护封建货币性质,同时又不得不改革货币的封建性质。这是一个矛盾,潜伏了几千年的矛盾。从清政府先极力维持制钱后又极力维持银两制,可以看出唐中期政府极力维持钱帛平行本位的影子。清末货币单位之争(两、元)相持七年而难定夺,可见矛盾之深。彭信威先生所言:“中国人民经过了两千年才找到并接受了一种新的货币单位,以代替旧式的铜钱”(1958, p. 846)。这绝非言过其实之谈。

中国近代的货币问题,实质上就是与西方货币势力的关系问题。西方货币势力利用中国货币的落后性和封建性大肆进行货币战。据估计,清末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 5 亿元,并以高价(高出 22%)流通,“漏卮”现象十分严重。而且铜钱大量外流(鹿传霖在光绪二十五年上奏说,走私出口每年达二、三千万串,清末全国制钱约三、五千亿文,依此,十几年将出口罄尽),“镑亏”严重,这就将中国逼到了非改革币制不可的地步。尽管对国内来说,铜本位、银两单位货币还是根深蒂固,但从世界货币的发展进程看,即就是实行银元本位已不算什么先进币制了。在清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放弃银本位,进至金本位³¹。在铜银由一般等价物

²⁹ 《清经世文编》卷 53。

³⁰ 中国造纸法于天宝十年(751 年)左右西传;中国纸币在元世祖时西传。

³¹ 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的时间为:英国,1816 年;德国,1871 年;丹麦、瑞典、挪威,1873 年;荷兰,1875 年;

成为一般商品的情况下,西方列强有意从中操纵,铜银价的剧烈涨落是必然中事³²,这就使中国的银铜平行本位陷入愈益不堪的境地。但有一点不可忽视:清政府币制改革的真正动机在于解决由赔款“镑亏”引起的财政危机,如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中所载当时美国财团代表司戴德的话:“事实上他们并无意于币制改革,只不过拿它作为一个好的幌子来借款而已”(1987, p. 243)。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一以贯之的动机和目的,其货币改革的财政性和殖民性必然决定其不彻底性和畸形化。

在西方各国已经从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时,中国却为铜银本位的转换而困扰。长期陶醉于铜锈气息的古老货币文明,在闭关自守的藩篱中失去了货币本位进化的机能。当这种格局一旦被外来异质货币文明所冲击,则因缺乏相应的应变机制而陷于被动。近代以降,世界货币本位随着世界经济的交融循环趋势而成为世界文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可以说,货币本位在近代以来不仅取决于一个民族货币文化的水平,更重要的则取决于一个民族整体文明的进程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

中国货币发展史在近代所处的困境是:长期植根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铜本位和银钱平行本位,实质上面临着既向银本位又向金本位转换的严峻困扰。可想而知,这种骤变进程(政治的、殖民的推动)是要付出比渐变进程(经济推动)大得多的代价的。一个民族的经济、民众的生活和货币的尊严(主权)会在这种骤变之下遭受蹂躏。

当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梁启超1915年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也说:“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已。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问题在于,西方列强纷纷介入中国币制改革,使中国亦铜亦银、亦古亦近的币制出现了一系列悲剧性的转机,最后不得不趋于金汇兑本位。早在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公布《国币条例》时,其《理由书》中就有如是说:“金汇兑本位制……诚为妙用,然行之而著效者,皆属殖民地,恃母国以为之卵翼。……国失其利权,利未形而弊先睹,故法虽善而行之维艰也。”并以为“今日中国所患者,无本位也”,以银本位作为过渡,并准备随时推行金本位。国民党在废两改元时,宋子文曾于提案中表示:“原欲逐渐推行金本位,以合世界潮流,而利对外贸易。乃年来环顾世界经济状况,衰落日甚。我国又外侮方殷,金融当力图安定,未可多所更张,不获已惟有先从统一银币入手,以确立银本位之基础”(周伯棣,

法国,1878年;俄、日,1897年;美国,1900年。

³² 据张家骥《中华币制史》第5编统计,1492年至18世纪末年,世界金银比价为15:1左右。到19世纪后期尤其是1873-1894年间,从15.9323:1上升到32.5873:1,1909年更涨至40.2881:1,1912年又降到33.6034:1,1915年回升到39.9151:1,1920年下降到15.3177:1,1923年上升到29.5263:1。就银钱比价而言,自乾隆三十年(176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145年间,经历了五次银钱价格的波动。第一次:乾隆三十年至咸丰四年(1766-1854年),每两纹银从800文钱上升至2600文以上;第二次:咸丰五年至同治四年(1855-1865年),跌至1200文;第三次:同治五年至十一年(1866-1872年),涨至1800文以上;第四次: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三十年(1873-1904年),跌至1200文;第五次: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年),由1100-1400文涨至1800-2000余文。

1934, p. 120)。这是一种自清末以来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代表性观点,但西方列强哪里肯让你心平气和地推行银本位。30 年代的白银政策一下子将这些期望变为泡影,接着不到两年时间,终于以法币这一殖民性(汇兑)货币本位的出台,给中国近代货币历史的矛盾予以暂时性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悲剧性解决。

彭信威先生说过:“他们(指当时一些中国学者——引者)以为货币制度的好坏,在于单位和货币种类的选择。这是本末倒置的。他们不知道一种稳定的货币制度,……在于财政和一般经济的稳定”(1958, pp. 20-21)。这其中道出了一个真理。严格说来,中国近代的货币问题是几千年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最突出体现。中国近代的经济基础最多只能适合于银铜平行本位或银本位,只是在世界趋势的挟持下,才不得不推行金汇兑本位。这样,就使货币本位的嬗递不是以经济的发展为依托,而是以世界货币本位的冲突较量为根据。在中国,任何形式的金本位在近代的实施只是一种现实矛盾无法解决条件下悲剧性结局的反映。总之,中国铜、银、金本位的转换在短短 100 年间骤变而成,从它早熟、发育不健全的幼年一下子进入了成年,但形体完全畸形,内质完全扭曲。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货币文化的自身融合和孤寂发展之后,在近代中西货币文化的撞击声中,渡过了风雨飘摇的 100 年。没有比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货币命运更可悲的货币发展轨迹了。

六、货币文化的中西碰撞：隐约可见的痕迹

中国的货币文化是独立形成和发展过来的,这已成为众所皆知的结论。但若人们由此认为,在 19 世纪以前绝没有任何地区和民族的货币文化给这个数千年独步的中华货币文化留下什么影响的痕迹的话,那将走向武断的理论歧途,客观的历史足迹是不以主观的推测为转移的。事实是,中国货币文化受西方货币文化的影响史是与中国货币文化本身的独步发展史相始终的。

据一些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最早当钱使用的玛瑙贝壳可能来自遥远的马尔代夫群岛。看来这一切最初一定都是由游牧人和巡游商人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边境以外传来的”(巴勒科拉夫, 1983, p. 151)。尽管这种探究的可靠性值得重新考证,但中西货币文化的交流在公元前即已出现却是无可非议的。西方国家在公元前 500 年的 200 余年中,已经铸造有金银币,小亚西亚率其先,波斯随其后;前 248 年,安息也铸了银、铜币。不久,中国进入百家争鸣的战国货币文化时代,其开放型的经济文化姿态正好迎合和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文化气息。也就是说,双方文化间不可能不发生相互影响。据希腊史学家奥尼斯克利道斯的《沿岸航行记》载,公元前四世纪前后,“西方诸国所用之丝与铁,皆从中国输来”。中国早在前 650 年已采用炼铁技术,既然输丝与铁于西方,那么西方便会以银币作交换物。在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以前,中原地带一定有不少西方货币尤其是银币在流通(或积存)。随后秦国以“革命性”的措施“同”了战国货币之“异”,对西方银币的流通自然不会置之不理。这样,秦始皇不但终结了中国货币文化真正发展的战国文化,同时也斩断了中西货币文化交流的历史。在司马迁的笔底留下了这一历史转折在货币史上的珍贵印迹:“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

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³³“殷得金德；银自山溢。”³⁴可见，银既是中西货币文化交流之物证，亦为殷货币文化之象征，这就是秦始皇不以银为币这个千古之谜的谜底。太史公所说的“虞夏之币，金为三品”云云，长期被人们误解；若抛开其时间上对中国古代帝王的依托，其黄、白、赤货币系列中的白（银）难道不正是春秋战国以来中西方贸易往来的货币象征吗？只不过到后来人们把这些货币和中原的钱布刀等杂在一起，以来这是先王之遗制，从而造成误解而已。因此，中国与西方货币的交流历史在秦以前已相当活跃地进行了好几个世纪。同时，华夏各国纷纷介入银货币文化之格局，特别是在楚国等盛产金银的地方。考古成果证明，楚国在春秋战国间曾大量铸造银饼³⁵，还有银布币³⁶等；另外，齐国有银刀（千家驹、郭彦岗，1985，p. 118）、中山国有银贝出土（朱活，1981）。由此看来，司马迁的表述是值得注意的，他说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之后又说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即：钱可能或金、或银、或铜，而布、刀、龟贝亦然，出土的实物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这便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

汉武帝时，在对经济尤其是商业实行特别的处理（利用）政策后，中西贸易便又开展起来，这是中西货币文化撞击的又一次好机会。据《世界史便览》载：“公元前二世纪，古代世界东西两端间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接触达到了高潮。虽然罗马同中国汉朝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各自都清楚地知道对方的存在。货物自由地流通，特别是从东向西流通……大量金银（大多是铸币）也经由海陆两路流通着。”不管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是为了政治的企图还是经济的目的，甚或是为求西域善马³⁷，但在货币文化交流上的积极意义和客观促进作用则是不容轻视的。就在张骞中亚探险 19 年光景之后的前 119 年，汉武帝铸白金三品，这难道仅仅是偶然？《汉书·西域传》载：“羁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又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大月氏国，民俗用钱，与安息国同。”《史记·平准书》载：“白金三品：其一……圜之，其文龙，……二……方之，其文马，……三……椭之，其文龟”云云。尽管汉武的白金三品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熏陶的产物，但受西方货币形制影响的痕迹仍然是很明显的。其“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这种天才的理性构思，若无西方货币文化的刺激，绝不会用在货币之上，更不会正好用在银币之上。中国货币向以文字为形制，而白金三品却以图案为形制，这便是西方货币文化和中国货币文化又一次剧烈撞击留下的痕迹。从秦始皇废银不为币到汉武复银为币，这难道不是秦汉两代货币政策及对待西方货币文化不同态度的见证吗？更何况西汉还铸有金五铢钱呢（千家驹、郭彦岗，1985，p. 123）！

在中国，银币的产生和行用无不与中西方的贸易相关，可以说，中国银币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中西货币文化的撞击史。汉代以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货币文化时常与西方货币

³³ 《史记·平准书》。

³⁴ 《史记·封禅书》。

³⁵ 《湖北江陵三座楚墓中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 年第 5 期。

³⁶ 《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楚国金银币》，《文物》，1980 年第 10 期。

³⁷ 《史记·大宛传》云：“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

文化进行交流,并在河西和岭南形成两大金银货币流通区域。在河西还以西域诸国的货币作为主要流通手段。史称:“河西诸君则……通用西域的金银钱和波斯银币。”³⁸“交广专以金银为货”³⁹。中国和拜占庭帝国货币文化的渗透有考古资料和实物作证。1953年—1976年先后在西安、河北磁县、赞皇的南北朝墓葬中都发现了拜占庭金币。《隋书·食货志》曾载,北周时“河西诸君,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彭信威也说过,南北朝的金银,曾经铸成钱形,这“应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受了外国金银币的启示铸造出来的。”(1958, p. 235)到了唐代,中西货币文化交流又开新纪元。在当时的长安城,有很多胡商,西市还专辟有波斯商邸⁴⁰,这种相互贸易一定将大量西域银币带入长安,从而对其货币施加影响;长安出土大量属于唐代的西方货币,可为物证(武伯纶, 1979, pp. 205-206)。

中原的铜铸币也时常打上西方货币文化的烙印。彭信威先生在谈到唐代铜币的星月纹时有这样的推测:不是什么文德皇后或太穆窦皇后或杨贵妃的“一屡娇痕巧印”(陈其年词句),而是“受了外来的影响。”他说:在西方,“钱币上用星纹的比较多,如希腊、罗马、迦太基的钱币上都有使用星纹的例子。”他还说,除“罗马有一种银币的背面有一大形新月,……特别重要的是波斯萨珊王朝柯斯鲁二世(Kosru II, 590-628)的银币,正面和背面的边缘上,星月的安排和开元钱上的所谓孕星是一样的。”后来又影响到阿拉伯、突厥(中亚);从中国魏晋隋唐各代同波斯大食的密切往来看,“开元钱上的月纹和星月可能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彭信威, 1958, pp. 300-301)尽管这还是一个很难确定的踪影。但从它特出于中国传统货币形制之外看,则可以断定它显然是中西货币文化撞击的一个隐约可见的痕迹,这 and 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的“和田马钱”的文化内含(圆形无孔)是相同的。彭信威先生对西方货币多星月并铸或单有星纹、中国货币绝大多数单有月纹,西方星有光芒、中国只有星点而无光表示不解,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人的美术表现手法与西方不同,即以线为主,重神而不重形云云。我的观点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所行用千年的货币形制,不可能完全受外国货币形制的影响。就连近代中国的铜银元也不可能彻底脱胎换骨。更何况中国天圆地方的总体货币形制在近代以前总是和西方圆形无孔的货币形制泾渭分明的。

唐代以前,中西货币文化的撞击只是以形制的撞击来表现。尽管西方货币本位(金银)和中国货币本位(铜)的差异长期存在着,但是,对于当时正在走上坡路的封建帝国而言,就不会对这种差异引起足够的注意。先秦银币和汉武帝白金三品的铸造也只是由形制上的外在影响造成的,因为当时中国的铜本位还不处于滞后的地位。经唐末的动乱,“中国与中亚之间深厚的文化联系被破坏了,中国变得更加内向”;“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巴勒科拉夫, 1978, pp. 249-250)。宋元以来货币文化的交流,就是因东西方贸易活动的长期对峙而不可能深入到本位层次。尽管这种态势为以后世界化经济贸易时代到来后的中国货币制度投下阴影,但起码在清代以前的中国,仍没有真正直接地感觉到。

³⁸ 同上,第127页。

³⁹ 《通鉴·梁纪十五》。

⁴⁰ 《续玄怪录》。

金元两朝的西方商业货币气息曾被浓郁的中原农业货币气息迅速吞噬掉。尽管在货币史上留下了一次银、铜本位相互冲突的光辉记录,但并没有给铜本位以足够的震动。中原的货币文化反而给“四夷”的货币文化造成巨大影响,整个六朝时代,便是一个游牧货币文化被汉化的过程;西夏、辽、金、元等国(朝)都相继铸造方孔圆钱;朝鲜、安南、日本都属于中国货币文化影响的范围,从而形成“远东的中国世界”⁴¹。日本、朝鲜分别在明治维新和李朝光武年间(1897-1906)以无孔圆钱代方孔圆钱,而越南一直到保大帝(1932-1945)时,还铸有“保大通宝”,直到1945年,方孔圆钱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饶有趣味的是,自宋以来,纸币的出现意外地干扰了经济对银本位的渴求,金、元也难幸免。金元两朝正是在纸币价值的狂陡声中走向灭亡的。此时,不但西方对中国的货币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影响,中国的纸币反而被马克波罗这位来自欧罗巴的大旅行家赞叹为“点金术”而西传欧洲。这可能是中国货币文化对西方产生影响的绝无仅有的史例。

中国在最强大时,其博大的胸怀曾容纳外部货币文化的影响,但总未能将这种影响引向内层。自从宋代这个所谓“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巴勒克拉夫,1978, p. 251)的时代过后,中原文化在对待外部文化上产生警觉心理,文化气度也由容纳(部分地加以消化)变为排斥。可是,元明以来,世界货币文化正处于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革而与之俱来的大交流时代。中国的货币文化却不能正视这个现实,从而使货币文化凝固于低值的或者是超经济的层面上,正是这种内质决定了中国货币史在明清以降的命运。

实质上,唐宋以降,中国货币本位自身也经受着内质的银、铜冲突,这种冲突直到明清时代才正式外化为中西货币文化的冲突。中国的货币虽然在唐宋以前曾长期受西方银币的影响,但与这种影响相并行的却是自汉以降长达二千余年的银块流通。汉武时的银铸币因内质与形制的冲突或不统一而无法成为真正的银本位币。问题是,银铸币和银块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货币本位层次,赫然著于史册的金承安宝货也是一种银两本位;更重要的是,这些银币不是在贸易中产生或投入贸易之中,而是辗转于非经济的赏赐、赠予等领域。如景泰帝查抄王振家产,仅银达六十余库;武宗籍没刘瑾家产,其中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九百余万两(千家驹、郭彦刚,1985, p. 136),可见一斑。

我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那就是,西方的货币本位为何那么早就处在中国的上层领域?自汉武(或更早的秦皇)以后,白金为何不能成为一个货币本位或者它的行用为什么无法与铜币相抗衡呢?中国唐宋以前的经济水平也并不比西方差,这难道仅仅是形制的冲突吗(如汉白金三品、唐开元钱的星月纹等)?

我认为,这种冲突的内质在秦始皇废银为器饰宝藏的“革命性”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就已牢固地确定了。我们已知,中国的货币文化是一个低值货币本位、独立发展的历史过程、流动性极为缺乏的流通格局,以及文化性胜于经济性的货币内质的组合体。货币文化本身的这种矛盾构成所显示的中、西方差别又何尝不预示着:与两种货币文化构造的不同矛盾格局必然联系着的文化冲突就不仅仅是形制的冲突了。

⁴¹ 同上,第249页。

七、货币本位冲突的性质

尽管自汉代以来中国内陆腹地的货币牢牢地附粘于铜本位之上,但在河西和岭南却很早就流通着金银币。若说河西是受西方货币文化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岭南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里出产金银吗?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为什么中原地带不因之而流通金银货币?我认为,其关键在于,这两个地域处在东西贸易两条丝绸之路(海、陆)亦即东西贸易链条的两端,经济贸易的浪潮将货币从超经济层次推到经济层次,并能够在贸易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货币本位。当然,存在于这两个地域的这种似乎超脱的高本位货币流通是不可能摆脱中原低本位货币流通的掣肘的,亦即限制了前者对后者所能施加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西方诸国铸银为币并不说明其经济水平比以铜为币的中国高(在宋元以前反而低)。“中国以铜为主,希腊以银为主。这种不同并不一定反映两国的贫富,可能是货币在两国的流通范围和流通深度上有所不同”(彭信威,1958,p.59)。所以,货币的高本位并不能完全与一国经济文化的总体水平相吻合。当然,中国的经济实力之“强”和货币的本位之“低”相结合本身,便表示处于这种结合之中的货币本位并不能反映经济的总体实力;同时说明其经济水平没有形成一种足以推动货币向高本位进化的格局。反过来说,货币本位并没有享受来自经济的有力推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断言:中国古代“发达”的经济是一种受超经济力作用的经济(即我们已知的农工经济衰落,官商经济高扬),因为作为经济发展尤其是货币演进的最大推动力在于交换机制的完备。中国古代经济正是在缺乏这种机制的前提下从极盛的高峰坠入衰弱的低谷。正是这种机制的缺乏,才使货币得以在中国长期扮演与这个由超经济力所支撑的庞大的帝国形象极不相称的角色(铜本位)。

中西货币文化的撞击实际上是各自经济内质的相互冲突。据我们已有的初步印象,西方货币的经济内质是迥异于中国的,正是基于这种内质,在经济不太发展(相对于中国)的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西方已有了看来与其经济水平极不相称的高货币本位的雏形。彭信威教授早有观察:“中国在殷代的情形,和希腊、罗马古代的情形不同。希腊、罗马古代已有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已使用金银为货币,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高,他们使用奴隶,是为榨取奴隶们的劳动以换取外国的金银和奢侈品,来供自己享受。”他还说:“货币是流动性最强的东西,传播很快,只要条件具备,……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自里底亚的铸币出现后,五十年之内,就传遍了亚琴海沿岸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即货币与贸易相结合)上,才出现“希腊的货币,主要用于对外贸易,所以单位价值大;中国在战国时期的货币主要用于人民之间的零售交易,所以单位价值小”(彭信威,1958,p.4,8,59)。的格局。当然,在战国间中国黄金的行用还是比较普遍的,其中的秘蕴自然是:各国间的经济贸易交往为黄金和白银的使用开拓了用武之地。秦汉以后,金银才大量归于“上用”,或转为窖藏,无法正常介入流转。汤普森说过:“当时的亚洲人,和现在一样,是有着窖藏金银的明显倾向的”(1928,p.49)。彭信威作过统计,中国和罗马的黄金数量在汉代是相等的,达17.9万公斤,但存在方式不同。在罗马,基本上载运于船舱里;在中国则深藏于窖柜中。可见,经济贸易的发达与否是造成中西货币本位巨

大差异的根本原因。贸易的发达本身并不能完全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经济的范围内;但却能够完全显示一个国家货币本位的嬗递程度。更重要的是,当贸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和环节时,它的发达和由此带来的货币的发达却成为展示一国经济实力的主要参数和要素了。

古代罗马、希腊和波斯的高货币本位正是借经济贸易之活跃而确立的。另外,贸易的媒介物不能带有任何民族的印迹(即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在世界市场要脱去其国家的制服才能发挥作用,参见《资本论》,第1卷,p.144),金银正是具备这种条件的媒介物。由此使西方很早就跃上银本位和金本位的阶梯。这种历史雨露滋润了此后的整个欧洲。汤普逊说:“拜占庭金币作为地中海地区交换的媒介这一优势,又是一个显著的经济事实。……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货币上面刻着阿拉伯字;显然是为了便于在埃及和北非穆罕默德国家内进行贸易而制造出来的。当西欧,包括除威尼斯和南意以外的一切地方,还用银币计算的时候,伊斯兰教西班牙和非洲、西西里、南意大利、拜占庭帝国、叙利亚和埃及,是按金本位来交易的”(1928,上,p.415)。波斯诗人萨第(1184年生)在其著作《花园》中曾记载一位商人的话说:“我准备把波斯的硫磺运到中国去卖,据我所知,硫磺在那里可以售得高价;然后我再把中国的陶器运到希腊;把希腊的或威尼斯的锦缎运到印度;再将印度的铜带到阿勒波;把阿勒波的玻璃器皿运到也门;然后带着也门的条纹衣料,回到波斯”(汤普逊,1928,上,p.449)。正是这种“商人的民族”精神,为货币高本位的确立增砖添瓦。当时中国和罗马之间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以波斯为中介,给了波斯经济不小的推动。汉朝时,中国和罗马的贸易都是入超,大量金银流向西域,基本上落入波斯商人的口袋。《后汉书·西域传·大秦》曾载:“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云云,叙述的就是这种史实。越是具有贸易性的货币就越具有交融和普遍的性质。第一次十字军“为了便利内地贸易起见,曾发行一种货币,一面刻着穆罕默德教象征和阿拉伯文字”(汤普逊,1928,上,p.500)。西方货币文化的传播融合是气象万千的,可以说,西方货币文化体系是经过了比中国频繁剧烈得多的冲突、交流和融汇形成的。

随着地中海贸易地位的下降,波斯的货币文化走向衰落,印度也是如此。可是,由于世界贸易中心向大西洋沿岸的移动,使希腊的货币文化在那里得到发扬光大。希腊早在奴隶社会中已用白银作主要币材;罗马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用铜,之后受希腊影响用银。另外,罗马虽在前第一世纪中叶开始铸造金币,且在帝国时代颇有增加,但在整个中世纪,西欧主要还是用银,只有到13世纪以后,在意大利、英法等国商业城市中因商品流通的发展而流通金币。

西方货币文化经过长期传播与融合,造就了货币的一些基本特征:一是形制,圆形无孔,以人像等(希腊文化的象征)为图案;二是绝少用铜质,基本上是(金)银本位。这种货币文化同时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是与其条件的发展同时发展的。其条件之一,便是贵金属的充分供给”(参见《资本论》,第2卷,p.367)。随着世界贸易在更大范围的扩展,尤其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它会被合乎逻辑地赋予扩张的性质。19世纪以降,面对这样一种内质特异的货币文化,中国的货币文化必然要受到一次严峻而空

前的撞击和震颤。

中西货币文化内质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的货币文化是在冲突和融合中形成并发展的,表现出主动外拓即外向的性格;中国的货币文化是沿着纵向、单线的历史轨迹独立发展而来的,表现出被动即内向的性格;前者借助商品贸易而生成,后者依赖自给自足的保守经济格局而存在;前者反映交换机制的发达,后者表现货币经济的式微。当贸易突破地区界限形成世界性格局时,这两种货币文化之间便必然出现极富掠夺性和被掠夺性的矛盾较量和冲突。基于中国货币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向性格和封闭格局,对外来货币文化便必然表现出先拒绝随即陷入被动的状态;外向性文化一旦遇到内向性文化的拒绝就会暴露出极其野蛮的气质。19世纪以来,世纪经济贸易急速发展,原来处于地球东西两端、在不同经济环境中成长且没有直接谋过面的两种货币文化,便一下子发生了最直接的接触,这种接触标志着中国千年独步的货币文化悲剧的开始。

英国船只于1637年第一次来中国,收获是,“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引自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一章)。而“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产物,他们不需要向任何国家购买价值一个便士的货物。”(引自罗伯特·赫德爵士《这些来自中国的人们》)。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格局正是中国货币内向性格及低本位形成的基础,既然西方货币文化所具有的外向性格一开始就无法与中国的货币文化进行经济性接触,那就必然要导向超经济的交手了。摆在近代中国货币文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拥有足够的能力继续保持其内向性格;另一条路则是正视外来货币的挑战。但结果则是:既无法保持内向,又不能正视挑战。当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摇篮中生活几千年岁月的低值货币本位遇到经历长时间贸易磨炼的高本位货币的挑战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时,国人方领悟货币本位之过低,遂陷入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货币本位困扰。可是,要在一个经济贸易十分落后的国度,在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时间里一下子解决货币本位问题,谈何容易。这不仅仅是一个货币本位本身的表层转变问题,而是一个货币内质即性格的递换问题。中国货币本位在近代的困扰,就是在这一系列关键性转换既无法顺利实现又不可能摆脱来自外部货币的挑战的情况下产生的。

八、铜本位的退出:仅仅是形制问题吗?

几千年来,作为中华货币文化象征的方孔圆钱不知寄托过封建统治者的多少幻想,他们不惜以整个民族经济的迟滞为代价,维护着它的存在。它躺在自给自足的经济襁褓中竟然度过了2100年的岁月,并形成了一个“天圆地方”的东方货币文化圈。不知有多少人或为之陶醉、或为之呻吟;更为悲壮的是,不知有多少经济发展机遇被无情地错失。何曾料及,这种天圆地方的梦幻会在2000年后的近代岁月里被来自天圆地方以外的力量施以致命的冲击。

汉武帝白金三品的形制现已不得而知,林剑鸣教授在其《秦汉史》(1999)中载有详图,但其可靠性仍属可疑。我们只有抱怨太史公所载之疏漏(其实已经够详尽的了)和考古之不争

气了。然而,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其形制是否天圆地方,从它仅作为五铢的辅助货币而言,是无损于天圆地方的总体格局的,更何况当时强大的汉帝国本身正处在天圆地方的确立时代。唐代的星月纹也只不过是方孔圆钱的点缀而已;宋金元以降,货币格局无不以维护和体现天圆地方文化精神的铜本位为特质。

清中叶以来,在西方货币文化的冲击下,尽管货币本位仍没有在内质上彻底摆脱铜本位幽灵的困扰(铜元的出现),但在形制上却标志着中国两千余年天圆地方光环的幻灭。在这个问题上,彭信威所持的意见是:“当时如果用机器铸造银铜两种或金银铜三种方孔钱,也是完全符合要求的”;并认为,“方孔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这种传统完全没有打破的必要”

(1958, p. 775)云云。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彭先生把货币的形制和货币的内质完全割裂开来,把方孔圆钱看作是一个与中国货币文化内质毫不相干的东西。实质上,几千年来,方孔圆钱的形制与货币文化的内质融合成一个整体,成为中国封建神权、小农经济、内向型货币性格的外化,它的幻灭同时标志着中国神权货币文化的幻灭。彭先生还说,中国的方孔圆钱为何不和西方一样用人象图案,是不是由于“中国美术家长久不重视人像雕刻”?当然,这是美术史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在此不作深究,但以此来论证中国为何要行用方孔圆钱是不够充分的。何况中国对人像雕刻也不是不重视,更非不发达;汉唐以来中国的雕刻艺术各领风骚,不乏杰作。所以,并不能以“人像雕得非常坏”来否定中国圆形(无孔)货币产生的可能性。很简单的道理,货币的神权内质必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神权形制。从这一角度看,天圆地方的幻灭对货币及其经济的发展而言反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但是,这种幻灭却是不正常的。若要说方孔圆钱的流通过程与货币经济的衰落过程相对应;那么,它的幻灭过程则与货币经济蒙受凌辱的过程相映衬。中国古代的货币自“天圆地方”形制一确立就是超经济力的象征;由此也似乎注定在它幻灭时也非要受超经济力的冲击不可。

当一个民族的货币无法成为经济的推动因素时,它终究也会在由此引起的经济衰落中无法成全自己。天圆地方的货币形制在西方货币文化的冲击下向圆形无孔的银洋形制骤变,铜元和银元都被大量仿铸,方孔制钱也被扔入历史卷宗。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西方货币直接介入中国货币格局,尽掠夺、操纵与瓜分之能事,一个东方帝国的货币主权从此丧失殆尽。“其时,本洋为中国之惟一流通银币,其势力渐蔓延至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直隶等省,……凡沿长江各地以及上海,皆有其踪迹。”“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甚行。”

⁴²货币格局的支离破碎与货币形制的幻灭相契合,且看清末的货币结构:外国银元占 43.33%,外国钞票 12.38%,中国银元 9.27%,中国钞票 12.55%,制钱 8.75%,银辅币 7.88%,铜元 5.84% (千家驹、郭彦刚, 1985, p. 207)。

尽管封建货币文化曾经竭力抵抗西方货币的渗透并进行畸化处理,如“……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自外国输入的银元,每经过一次手,便称一次,加上一次

⁴²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19,考 7692,道光帝上谕。

戳,……这种洋钱渐失其原形,只能以两来计算。”⁴³但都无法将方孔圆钱(还有货币主权)挽留(和捍卫)于近代的历史舞台之上。但是,天圆地方的幻灭本身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货币文化的内质,货币还是未能摆脱超经济力的驱使(西方货币超经济力的渗透更增加其强度)。也就是说,“天圆地方”的幻灭本身只是变换了中国几千年神权货币文化的形制,其内质仍然是超经济的。

当货币形制与实质经济不能正常结合时,外来货币文化的撞击必然要酿成悲剧。方孔圆钱的被淘汰,不仅仅是货币表层形制的幻灭,而是一个民族传统货币文化及其整个民族悲剧性命运的缩影。因为,货币往往是一个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浓缩体。于是乎,货币的命运毋宁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了!实际上,中国古代几千年间,货币被神权所笼罩和被超经济力所驱使本身早已埋下其悲剧性命运的种子。由此决定近代中西货币文化的撞击所必然表现出的异常格局和结果: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平等交融,而是超经济层次上的强制性冲突;一方主动而蛮横,另一方被动而软弱。由此导致的“革命性”骤变,具有莫大的破坏力,它不但不能荡涤传统货币文化的糟粕,而且还会给这种文化渗透某些变异的因素。“倘使说,殖民者的功勋是因为它们沐浴在先进的文明价值的光环中,那么它们毁坏的恰恰是这种文明价值可能实现的基础”(黄万盛,1988,p.236)。

九、“本位困扰症”

19世纪以来,中国的货币文化呈现出一种过渡性格局,也就是说,它卡在封建性货币文化与资本主义货币文、保守内向的货币文化与殖民外向的货币文化之间。这种畸形的货币格局是近代西方货币文化的国际化趋势与中国传统的货币文化碰撞、夹击的结果,是传统与现代、沉沦与进步、封闭与开放、外来因素与内部因素相互纠缠混合的杂交体。它是以中国传统的铜本位向银本位币进化或过渡为主线展开的。铜本位向银本位进化机制的失灵和在西方货币文化撞击下又不得不进化的尴尬两难局面,使近代百余年的中国货币文化陷入深深的困扰之中。我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本位困扰症”。中国近代百年的货币史便是被这一病症折磨的历史。

更为棘手的是,中国的铜本位面临双重的本位困扰,正如马寅初先生所感叹的:“今日之本位问题,金银二者兼有,实无法解决”(1935,p.524)。当中国在19世纪以来被铜银本位之转化所困扰的时刻,西方国家又相继步入金本位时代,这就使中国在没有完全实现铜银本位转化的情况下,又遭遇到银金本位转化的问题。从清末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朝野人士无不为此手足失措,时而狂想金本位,时而悲叹银本位,时而欲取西方货币文化之意而推行金汇兑本位。历史的沉重包袱压在这几代人的身上,使他们幻想、呻吟、挣扎和无奈。

梁任公可谓近代为货币所困扰者序列之代表,他一开始反驳精琪的币制建议(实行汇兑本位)为“童稚之言”;旋即力主“用金以为币”,说什么“中国若不实行金本位,则将凋瘵以毙”;后来又主张先实行金汇兑本位,再进至金本位;最后声称,金本位不易速成,应暂时

⁴³ 《清宣宗实录》卷235,第3-4页。

采用银本位⁴⁴。货币见解之如此摇摆不定,充分表现出极端困扰之状。

在这种思想困扰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紊乱不堪的货币本位现实。货币进化越迟滞,就越无法确立其本位。其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的货币虽然倾向银本位,但被银两的流通和纷杂的银元制度所阻隔,无法真正形成银本位。实质上,近代中国还面临着一个从银两本位向银(元)本位过渡的严峻问题。据朱僊先生研究的结果,中国古代所谓的银本位实质上就是与铜本位相辅而行的银两本位,自1197-1933年,共经历了736年的漫长历程。该时期铜本位正好由盛转衰,银两本位便为挽救铜本位的命运应运而生,所以银两本位本质上仍属铜本位的系列。朱先生认为:“严格言之,银两实无本位可言,一因无国家铸造,无法货性质;二因民间自由铸造,故形色、名称、重量、成色,皆不一致。……虽然,中国向称用银之国,外人记载中国商业者,皆曰用银本位。但在国币条例未颁布以前,……中国果用何种银本位乎?既非银元本位,又非银条或银块本位,无以名之,名之曰银两本位可耳”(朱僊,1943, p. 215)。难怪周伯棣先生在吉田虎雅《中国货币史纲》译序中也说中国“没有货币本位”。

为补铜本位之弊,中国的银本位总是以银两本位这种扭曲的形式出现,使银本位对铜本位的替代关系蜕化为补救关系,银币本身也成为封建铜货币文化的组成要素。在铜、银本位的嬗递过程中,竟还遇到“银两本位”的严重掣肘。可以说,中国铜、银本位不能顺利进化,其关键在于“银两本位”的顽固性和两重性,它既有铜本位的性质,又有银本位的要素。实质上,从铜本位向银(元)本位转化要比从银两本位向银(元)本位转化容易得多。银两本位本身所体现的封建货币文化性质,使它与封建经济机制相互渗透在一起。难怪道光帝曾极力阻挠制造银钱!清末竟然为银币单位掀起那么大的争论波澜,其中奥秘便在于此,对银两本位的改造触到了封建货币文化的痛处。清末统治者曾经作出的向银元本位进化的姿态(自铸银元)是在西方货币文化的逼迫下不得不进行的抉择,如果没有这种外在力的驱使,清政府很难自觉产生如此动机和举动。张之洞一语中的:“中国财窘商弱,不能自成风气,以后尤甚。若银元轻重,恰与洋元相同(即7钱2分—笔者注),尚可依傍洋银而行。”⁴⁵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清政府不可能彻底完成本位进化这一历史使命,而使银两本位一直残存到20世纪30年代。正是由于封建银两货币文化的掣肘,才使银元制度也紊乱不堪。如“民间显分畛域,此省所铸,往往不能行于彼省,仍不如墨西哥银元之通行无碍”;“流用时多按其重量计值不按枚数计算”(魏建猷,1955, pp. 130-131)等等,无法形成一个统一健全的本位制度。

有人说,中国银本位迟迟不能确立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不是产银国,这当然站不住脚。明代后期的近百年时间里大约有四五千万两白银从美洲、日本等国输入,据说由此导出了著名的“一条鞭法”。银本位不但没有藉以确立,反而更加倾向于维护铜币的地位。清代自康熙二十年(1681)到道光十三年(1833)的150余年间,从欧洲、菲律宾、日本输入白银有几亿两之多(彭信威,1958, p. 854),还是没有推出银本位。看来,银本位本身与白银的数量并无本质联系。

⁴⁴ 《饮冰室文集》,《饮冰室丛著》第10种。

⁴⁵ 《皇朝政典类纂》,钱币11,第11页。

20世纪30年代的“废两改元”，不管其动机如何，它毕竟完成了千百年未竟的确立银本位的历史使命。但是，在西方货币文化（金本位）的逼迫下也无法顺利而独立的发展。自清末《币制则例》（1910）尤其是《国币条例》（1914）颁行以来，人们对货币本位问题的议论，逐渐从是否行银本位向如何行银本位转变。在朝野上下所关注的问题中，似乎存在这样一个焦点，那就是急于确立一个货币本位，因为“恶本位胜于无本位”。基本思路是：先行银本位，然后再向金本位转换。其原因自然是没有遽行金本位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货币本位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货币问题，当时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已无法给中国以独立确立货币本位的机会。经几十年周折，《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终于于1933年3月3日出台，它标志“新银本位于是乎成立”。

但是，刚从困扰中解脱出来的银本位，旋即又陷入更为痛苦的困扰之中。原因非它，中国货币本位的支配权操纵在西方之手。当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西方各国的货币金融陷入困境时，本位落后的中国必然成为它们利用货币缺陷转嫁其危机的目标。美国白银政策的实行给中国刚刚确立的银本位以致命的冲击。1934年7-10月中旬（5月实行白银政策），“白银流出凡达二万万万元以上，设当时不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库，必有外流罄尽之虞，此为国人所昭见者”。由此引起“工商凋敝，百业不振，……经济日就萎敝”，1934-1935年间，上海就有近1600家工商企业倒闭⁴⁶。于是乎，人们为银本位渗淡筹想的思维神经还未松弛，又不得不为“梦想最良之本位”而重新绷紧。且看1934年9月，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的一段话：“中国为银本位制国家，白银巨量流出，令人震惊。……为避免损舍计，不应单独维持银本位制度，故已考虑逐渐采用金本位货币”⁴⁷但这一梦想的实现过程，却交织着民族的巨大痛苦和耻辱。一方面，使自精琪、赫德、卫斯林、甘末尔等数十年执着追求的计划找到最终实现的契机，也就是使西方货币文化操持中国货币主权的梦想得到最后实现；另一方面，使国民党超经济驱使货币运行亦即使货币成为其强权经济垄断工具的梦想也得以实现，从而使金本位这一数十年来一直奉为归宿的目标却永无在中国实现之日。金汇兑（实质上连金汇兑都不是，因为在1929-1933的经济动荡之后，英、美先后于1931、1934年放弃金本位）这个曾被视为“恃母国以为之卵翼”、“利未形而弊先睹”⁴⁸的本位制度，却在短短的20年间成为现实。中国近代以降，近百年的“本位困扰症”以法币的出台而落得个悲剧性的结局。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法币的准备金为银六成、有价证券四成，由此造成一次空前的白银国有政策，且“对于各县政府办理收兑现币事宜，应明定功果，列入县长考成”，“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国民紧急治罪处治”，以致到抗战前夕，“中中交农四行收兑银币共达三万万余元”⁴⁹大有秦始皇尽收天下之铜于咸阳、汉初“尽收天下铜归于上”（贾谊语）和王莽黄金国有之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言，法币制度本身是中国传统货币本位进化机制失灵情况下被动“进化”的一种回光返照；它无疑也是以“骤变”的方式确立的，并没有经济机制的

⁴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⁴⁷ 《中国银行物价问题》。

⁴⁸ 《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理由书》。

⁴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配套，从而使其统一货币的功绩被超经济力的驱使所冲消，就如同秦始皇一货币于半两的历史功过一样。秦皇所不能及者，法币失去了一个民族货币最为可贵的独立性和自尊意识。这样，货币最可贵的两个性格（经济性和独立性）在法币身上都丧失殆尽，最终使其统一性失去意义。这样，法币就成为中国货币发展史悲剧性结局的一个绝好象征。

十、结 语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货币制度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迁而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的短暂调整，人民币制度作为一种不可兑换货币制度开始了它先“服务”于中央计划经济运行而后又经历经济改革与开放历史性巨变洗礼的不平凡历程。这一历程迄今已历 60 年的时间，若就中国货币历史数千年的演进过程看，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在这短短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全球货币制度以及货币交易关系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原有的金属货币本位让位于不兑换货币本位，原本可以兑换贵金属（如黄金）的货币（如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完全淡出于货币历史演进的舞台。既然都是不兑换货币制度，除了完全可兑换性（与别国货币）之外，人民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特别是那些国际性货币在“本位层次”上是否就可以“无差异”或者“平起平坐”了呢？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要对此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需要我们对相关货币演进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察，这无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研究任务。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相对于那些国际性货币，人民币制度有一个“先天不足”，也就是说，它不存在可以继承并引以为豪的高货币本位“遗产”。诚如前述，贯穿中国货币演进历史数千年的是低货币本位（铜本位），货币本位的升级和嬗递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的努力和痛苦的挣扎之后终归无功而返，人民币制度就建立在这种未能正常成长和展开的货币演进逻辑之上。相比之下，现今的大多数国际货币，都无一例外地完整经历了金属货币本位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际货币在经历了金属货币阶段的“本位成长”之后，紧接着得到正在发展中的商业银行制度的关键性支持，而随即完成了“外生货币”向“内生货币”（也称银行货币）的转换。经过这种货币转换，一些货币（如英镑、美元等）由于伴随着经济贸易的国际化发展以及现代银行体系的跨国经营而最终赋予了它们充当国际经济交易“媒介”的功能。不无遗憾的是，中国大多数时期的货币制度未能经历上述两个层面（金属本位层面与银行货币层面）的货币转换，由此造成的演进环节缺失使得人民币制度先天地缺乏只有经历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过程长期锤炼才能获得的宝贵“基因”。无疑的，这种“本位基础”以及本位演进过程的差异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注定是长期的和深远的。

参考文献

- [1] 巴勒科拉夫, G., 1978: 《世界史便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中译本。
- [2] 傅筑夫, 1981: 《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3] 黄万盛, 1988: 《危机与选择》, 上海文艺出版社。
- [4] 吉田虎雅, 1934: 《中国货币史纲》, 中华书局, 周伯棣编译。
- [5] 加藤繁, 1959-1963: 《中国经济史考证》,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 [6] 李约翰, 1987: 《清帝逊位与列强》, 中华书局中译本。
- [7] 林剑鸣, 1999: 《秦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 [8] 雒雷, 1989: 《论秦统一货币》, 《中国钱币》第 1 期。
- [9] 马寅初, 1935: 《中国经济之改造》, 上海书局。
- [10] 彭信威, 1958: 《中国货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重印本。
- [11] 皮朗, H., 1936: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中译本。
- [12] 千家驹、郭彦岗, 1985: 《中国货币史纲要》,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3] 斯宾格勒, O., 1918: 《西方的没落》,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中译本。
- [14] 汤普逊, J. W., 1928: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中译本,。
- [15] 汤因比, A. J., 1956: 《历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中译本。
- [16] 王献唐, 1979: 《中国古代货币通考》, 齐鲁书社。
- [17] 王亚南, 1957: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 人民出版社。
- [18] 魏建猷, 1955: 《中国近代货币史》, 群联出版社。
- [19] 武伯纶, 1979: 《西安历史述略》, 陕西人民出版社。
- [20] 萧清, 1984: 《中国古代货币史》, 人民出版社。
- [21] 张家骥, 1926: 《中华币制史》, 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
- [22] 朱活, 1981: 《古钱》, 《文物》第 2 期。
- [23] 朱僊, 1943: 《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 中国文化服务社。